

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

董淮平

郑观应(1842~1922)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先驱,他的一系列论著或为时人注目,或为后人尊崇。通过对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的探析,展示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对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认识,将会有个明显深化。

《救时揭要》共集结了24篇文章,均为时论。撰写这些篇章的时候,郑观应20多岁,并开始其买办生涯,在宝顺洋行负责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宜。由于职业选择乃“家贫服贾,负米娱亲”的被动性,使他来自传统教育的“济世”情怀受到阻遏,于是“徒深投笔之心”^①,用年轻而又焦灼的目光透视着他生活的世界,表达它们发生的变化。这样,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对于后人便多了一份历史的生动。

《救时揭要》中的社会问题,是通过关心“人”这样一条线索展示的,比如有关澳门猪仔的系列文章;有关流民、中国船员、出洋之商人、病人与女婴的遭遇等等。“夫猪仔馆者,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其所居名曰招工,欲谓之‘买猪仔’”^②。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此现象的论述,在《救时揭要》中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在与此相关的7篇文章中,郑观应对“猪仔”的境遇表示了深刻的关切,指出了清廷与英国政府应负的责任,呼吁当局采取法律的手段防止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与蔓延,以避免国人的悲惨命运。同类的文章还有《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文中建议清政府“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③,以保护华商的利益。与中西文化冲突有关的,有《痛亡者无归论》篇,这里牵涉到中西风俗的差异,郑观应痛陈广东籍船员陈晓峰在法国轮船上染疾不治而被海葬的遭遇,认为西方船员遇难海葬“虽属残忍,然自外国人行之,亦似可恕”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他认为,由于“风俗各有不同,各自有别”,而决不能用在中国人身上,特别是在“人为中国之人,地为中国之地”的情况下,西方人“既入我中国营生,当依我中国规矩”^④。从通篇的论述来看,人死后肉体的归葬也被视为完整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对于生命的重视,还可见于《劝戒溺女》、《劝戒杀放生论》与论及医生、医院等文。前两篇对于“天意”决定的自然生命的珍惜溢于言表,从他论述时的引文看,其观念显然受了道家与佛教的影响。虽然《劝戒杀放生论》谈的是动物的生命,但结论部分的落点仍然在“推爱物之心,为爱人之举,乐施孝友,济弱扶倾,救人一命,胜救百万生物”^⑤之上。后两篇为“天下苍生计”^⑥的色彩依然浓厚,他所涉医德、医术与医生、医院的考核办法,无不关乎病人的利益。

郑观应对人之现状的关心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本身的命运与遭际;一是人对于国家的意义,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他在文章里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基于这样的人间情怀,社会陋俗便成了他的抨击对象,这类文章除上面提到某些篇章以外,主要还有《拟自禁鸦片烟

论》^⑦与《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⑧。即便如此,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人和人心、人的精神状态。其实这也是他谋篇《劝公门修行》、《或问守身要旨》等类文章的目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于末俗人心,或可少裨万一。是则区区之心所深慰也已”^⑨。当然,郑观应同时也将救时主张的实施期望,寄托在当时的政府与缙绅身上。在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的论述中,他都要提出一种对策,要么建议政府实行,要么建议各地有势力的人物向当局呼吁,这些对策大致涉及资金、管理手段以及与外国政府的交往。

这样,青年时代郑观应的视野就在我们眼前一一展现,这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有抱负的年轻知识者的视野:有问题的社会,无能的官府,受难的民众,趋于末俗的世道人心……。使我们联想起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忠直的士人,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清末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接续。他虽然已经在努力地学习英语,已经在英国人的宝顺洋行就职多年,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个现代的企业中接受专门的训练并以这种手段谋生,但是中国正在或必将发生的变动,特别是这种变动含有的复杂底蕴他尚未了解,他只是依靠本能(当然这里指的已包含知识背景在内)在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于是就有了人、人心、风俗这样一个主要的框架。因为“民为邦本”,而对于人来说,“心”是根本,所以“经天纬地,赴汤蹈火,无不由于一心;为圣为贤,成仙成佛,亦无不恃乎一心。三教经书,无非治此心也。”^⑩这也就容易解释,郑观应的一系列时论,何以会那么急切地表达扭转人心的愿望。或许他认为对于“末俗”来说,惩戒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说教中大量的佛道因素,最典型的如“因果报应”,但这里所指的佛道因素并不属于精英文化那部分,而是积淀于民间的较为原始的思想资源,也就是现在被大家称作迷信的观念。他叙述了很多这类故事,极像一个老祖母用恐吓的方法在劝她的孙子不要做坏事。这个时期,他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具有救时之激情,但他还没有从他的职业、他所生活的城市习得一种根本的精神。

变化发生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中,这篇短论虽被收录于《救时揭要》,但据夏东元先生的考订,它是在1873年《救时揭要》临刊印时加进去的,撰写时间当在1873年1月以后^⑪。从篇首“《瀛寰琐记》所论《内地轮船进止议》,深合符节,实获我心。余故参以鄙见,合质高明。”^⑫从这段文字分析可见,郑观应当时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与《申报》所刊《瀛寰琐记·内地轮船进止议》中的话题产生了共鸣,并且还想表达一些他个人的看法。郑观应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总结西方造船业与航运业发达的原因,即“其最要者则在经费之多,且在乎驾驶之熟也”,列举了西方商业社会的优势:在集资方面,“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盖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就官商关系而言,“商不虑官之无信,官亦不借商为可耻”;对于未成功而尽力者的态度:“外人并不以为非,绝无讥刺,且尊敬之,体谅之”。相形之下,他发出“岂中土万余年来,吝惜涣散之风气所能效之乎”的慨叹。他还赞美了“泰西驾驶之船主”的博闻多识,“兵船司炮之官”的技术精炼,“在船之兵”的勤奋与“坚忍果毅”;尤其欣赏这些国家的“水师提督、王子、贵人,苟在行伍,亦须事事皆能……上与下有督责而无等威”的习尚,而比起这些来,“诸文士笔下千言,胸无一策,或习武艺,闻炮相惊者,虽掇高科,于国家何益哉!”^⑬更为重要的是在论及中国轮船“进止”时指出了“改商造为官造”的重要性,“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则,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⑭当他说上海、江苏、闽省情形的林林总总,娴熟程度无异于一个行家,此时,古代士子的色彩消退了,职业训练的本色显现出来,与之相映衬,“古人云”之类在《救时揭要》系列文章中大量出现的表达方式也消失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折。

撰述上文以及《易言》各篇期间,郑观应当上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并拥有了其中的股份,又于1874年出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其权力相当于总买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办了。

《易言》的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而这一“广泛”又是与其时郑观应的社会角色极相吻合的。《易言》依然包含着与《救世揭要》的关怀一脉相承的东西,即对于时弊的专门论述,如《论鸦片》、《论传教》、《论虚费》、《论招工》、《论医道》、《论犯人》、《论栖流》、《论裹足》等。这些篇章与过去比较,似乎更偏重于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并总结了他们的侵略目的:“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心。”^⑩在这里,借鉴的成分增加了:如对西医的介绍,是《救世揭要》两篇医论都未提到的;在《论犯人》中引入西方对于囚犯的律法,认为“充公一端,实可补中国刑书之阙”^⑪。提出的对策也比以往更系统,在禁鸦片与流民安置问题上均是,个别地方还相当尖锐:“今欲中外相安,惟有会集万国公议妥商,劝令英不贩烟,法不传教。至保护洋商之责,我中国自任之。”^⑫在抨击裹足陋俗时,不仅有“古训”依据,而且还与五大洲作横向比较,指出其不合理性。

《论税务》、《论开垦》、《论治旱》、《论铸银》、《论邮政》、《论盐务》、《论治河》诸篇所涉多关经济,这是传统社会同样会遇到的问题,但若与《救世揭要》相比,对时局的思考更为系统化,形成了比较专门的领域,甚至可以使我们据此总结出一些表述方面的特征:(一)沿用传统的概念。如夏禹之会计,周官著理财之条,管仲治齐擅盐铁之利,古者邮传之驿等等。(二)在考察弊政时注意对中西利弊进行比较,如《论铸银》中“西人好利而守信,故成色均归一律;华人嗜利而寡信,故流弊遂至百端。”^⑬再如论及税务时指出当局的政策过分“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商,其获利厚矣!”所以“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⑭。(三)介绍西方诸国解决所论问题的各种办法,常常以与西方的关系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并强调变革的观念。与前述风格比较一致的还有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论述。《论边防》、《论水师》、《论练兵》、《论火器》、《论民团》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显然与70年代的边疆危机有关,郑观应对此的思考依然是系统的,武器装备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更强调军制的作用。在阐发“全民皆兵”的观点时,他介绍了西方“寓兵于士、工、商贾”^⑮的优越性,同时指出这种制度与中国春秋时期的“寓兵于农”制度颇为契合。这种逐步趋于成熟的思考与表述,显然说明郑观应此时对中西国情的认识不仅更为广泛,而且也更加深刻了。

上述诸特征反映了一种思维倾向,这种倾向其实与后来的康有为、章太炎等思想家的思维特点是一致的,当他们在寻找变革依据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回首遥望远古,看见的又总是已经被理想化了的美好。这似乎就是这一代人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作出反应时的特殊语境。类似的情况还有郑观应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论述,它们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有对应关系。比如有关统治方法的考察,也是相对于《救世揭要》的新内容,从中还能看出从“人”到“政”的视角演变,也可以说他的思考已具备了一种政治学意义。

先看看有关内政的内容,它们大抵相当于古代“术”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就是“上法三代之盛典,旁采西国之良规”^⑯。学术界一般给予《论议政》一篇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郑观应要求改变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达。但是由于他对“三代”和西方政

治制度的简单类比倾向,我更赞同他是从中国传统的“通上下”、“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理解议院这件事的观点,即把它视为“通上下”的机关而非权力机构^②,通过这种手段“体察民情,博采众议”,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从而达到“长治久安”^③的目的。他对吏治方面的考察一方面奉行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如《论廉俸》、《论书吏》篇中所尊崇的奉公与廉洁。另一方面则在传统的形式如“考试”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如对文科、武科考试范围均提出革新设想,在武科中还建议增加算学、格致、机器制造等,并附专篇以论“洋学”,尤强调“变通”以“克敌”。这种对人才标准的新设计是应客观环境变化而生的,同时它也向着对统治者的期望延伸。《论游历》篇即通过赞赏西方“皇子与齐民无异”体现了他对于君主的期望,他列举西方王位继承人游历各邦,“周知各处之风土人情,各国之政刑技艺,而格致、历算、兵、刑、礼、乐等事,无不亲身力为,明如指掌”的情形,认为西方的富强与这些“皇子”“一旦即位,遂举生平之阅历,以为经国之谋猷”^④密切相关。虽然仍持“人治”的传统政治观念,但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却是适合时代变迁的。

如果说,上述内政问题因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对应比较紧密,从而使郑观应在传统的语境中游刃有余的话,那么外交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对此,当时一部分官僚与文人或被华夏中心论所遮蔽,或者由于情感上的窘迫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郑观应直面“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⑤的客观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各国官商教士“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⑥而造成的华商交易不公正与中西立约不平等;批评中国政府官员不懂“敌势洋情”,外交上“随则病国,激则兴戎”^⑦的不利态势;认为应当了解西方法律,设置专门人才依法处理牵涉两国的纠纷。他还撰《论公法》篇分析世界政治格局,虽然在触及西方历史时难免对祖国悠久的文明有一种自傲倾向,但在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意识中,显然具备了理性与平等的因素。

郑观应生当19世纪,那个时代,是“以世界贸易——工业——基督教——科技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崛起,形成并扩展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以农业——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东亚世界和以农商结合——伊斯兰文明为特征的阿拉伯世界都急剧衰落”^⑧的时期。这是从事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对这个时代总体特征的概括。而我们竟能看到,生当其时的郑观应对中国种种衰落征候的揭示。到了著述《易言》时期,他更认识到带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些新事物对于中国的巨大意义。于是又有了一系列分析,囊括在《论火车》、《论机器》、《论电报》、《论船政》、《论商务》、《论借款》等篇幅中。当我们细细阅读这些文章,会对它们的表述风格产生异乎寻常的感觉:只有横向的联系,“三代”——西方——现实的对应消失了;“泰西”之强项因专门而详细的介绍而更为明朗化。由于这些文章特征都能从《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中见端倪,故无庸具体剖析。但值得提到的是,他对盛行于清廷的有关西方器物价值取向之误导的清醒认识:“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今行于中国者,轮船、枪炮之外,如钟表、音盒、玩好等物皆有损无益者,而华人爱之购之;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皆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以故振作难期,漏卮莫塞,识者伤之。”^⑨这时候的郑观应,已经有一点早期资本主义的清教伦理精神了,尽管孕育这种精神的因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职业与生活环境,他已经具备来自现代社会的一种讲求效率的观念。出于对工业文明的理性认识,他冲破传统好恶倾向的束缚,对那些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物从而不易为人接受的西物,也就是能促使中国强大的物质文明给予了格外的青睐,并努力阐扬自己的观点。

郑观应早期思想系统的形成得益于他“不仕不隐,亦吏亦儒”^⑩的边缘地位,而他在这一时期所处的生存空间——上海,为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并使之具备了时人并不多得的境遇与视角。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能够稍稍游离“泛道德化”的主流文化倾向,在当时的“体用”思维原则下焕发出独特的个性色彩,构成他人不能任意取代的思想价值。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过程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同样源自“中体西用”原则,但所提供的思想成果与思想价值可以大不相同。所以,当我们看待“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这类口号或思维倾向时,如果能将其从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语境中分离出来,少一点“泛道德化”的政治诉求,那无疑会更贴近前人的生活,更贴近我们未曾经验过的历史,更多地发现前人迸发的思想火花,更透彻地领悟它们的当代意义。

注 释:

- ①⑨⑩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 ②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
- ③④⑤《郑观应集》(上册),第21页、32页、40页。
- ⑥郑观应:《议遍考庸医以救生命论》,《郑观应集》(上册),第26页。
- ⑦⑧⑫⑬⑭《郑观应集》(上册),第19—20页、34—35页、52—55页。
- 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7页注②。
- ⑮⑯⑰郑观应:《论传教》,《郑观应集》(上册),第121页、123页、95页。
- ⑱《郑观应集》(上册),第157页。
- ⑲郑观应:《论税务》,《郑观应集》(上册),第70页。
- ⑳郑观应:《论民团》,《郑观应集》(上册),第139—140页。
- ㉑㉒郑观应:《论游历》,《郑观应集》(上册),第101—102页。
- ㉓雷颐:《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家试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 ㉔郑观应:《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 ㉕郑观应:《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5页。
- ㉖㉗郑观应:《论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17—118页、119页。
- ㉘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 ㉙郑观应:《论机器》,《郑观应集》(上册),第89—90页。
- ㉚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作者:董淮平,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编辑部编辑)

[责任编辑 李明山]